

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蔡明諺

一、逝者已矣

對於台灣文學評論界來說，2013年之「始、終」，瀰漫著感傷與哀悼。2013年1月3日，顏元叔過世的消息開始在報章上披露（前此12月26日因肝癌在台病逝）。而在12月31日，2013年的最後一天，夏志清的死訊（12月29日在紐約辭世）竟又傳來。於是，一個時代的台灣現代文學批評，似乎就這樣悄聲地又翻過了一頁，進入歷史浩瀚的卷冊之中。

在台灣的現代文學批評史上，顏元叔和夏志清都是「新批評」方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只是他們揚名的時間先後不同，所持的論點大小有異，而且甚至曾在1976年正面對壘交手。夏志清的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這本書主要受到「李維斯的理論及新批評學派的影響」（王德威），¹但其中文譯本（劉紹銘主譯）卻是遲至1979年才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印出。因此夏志清對台灣現代文學批評學界產生普遍的影響，大約是在八〇年代以後。²

至於顏元叔則是從1969年初，開始在《幼獅文藝》上介紹〈新批評學派的文學理論與手法〉，1971年起翻譯連載〈西洋文學批評史〉，而在1972年6月《中外文學》創刊號上，以〈細讀洛夫的兩首詩〉作為發端，開始了一系列憑藉「新批評」方法，對於台灣現代詩人的細讀與批判。由此，「新批評」對台灣的文學批評史的發展，產生重要而且強烈之衝擊。余光中在2013年初追悼顏元叔的文章中說：「對於台灣七〇年代的學府文壇，他剛健的背影，重大的貢獻，卻十分可觀。首先，他以新科博士的銳氣，將當時美國的顯學：新批評與比較文學，引介回來，不但大聲宣揚，而且大力演練。更難得的是：這些新學他敢於活用，並用以探索台灣當代的詩與小說。這麼一來，外來的理論就不再自囿於學府的課本，而變成了一把燎原野火，和本土的創作燒成一景。不但外文系，連中文系也覺得用武有地了」。³

2月，《文訊》328期刊出「有遠見的開創者：紀念顏元叔教授」專輯，登載胡耀恆、彭鏡禧、呂正惠、張瑞芬4位學者的文章。胡耀恆和彭鏡禧對於顏元叔在台灣大學外文系所推展的課程改革，以及顏元叔長年推展編譯工作同樣表達了肯定。與此同時，胡耀恆還特別提及顏元叔引介的「新批評仍

1 王德威，〈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xiv。

2 夏志清的相關悼念專輯，由於不在本年討論範圍之內，因此暫無引介。可另行參閱：「直言無忌的文評巨擘：紀念夏志清教授特輯」，《文訊》340期（2014.02），頁27-43。「發現者，命名者——紀念當代文學評論巨擘夏志清」，《印刻文學生活誌》128期（2014.04），頁30-100。

3 余光中，〈顯極忽隱，令人惆悵〉，《聯合報》，2013.01.23，D3版。

不失為解讀作品的一種方法；更重要的是，由他引進推廣的許多詞彙，仍在我們的批評論述中常見，如close reading（細讀）、paradox（悖論、似非而是的雋語）、ambiguity（歧義、模糊點）、tension（張力），以及irony（諷刺、反諷）等，不勝枚舉」（頁52）。呂正惠認為，顏元叔所做最重要的幾件事情是：第一，他想要有系統的評論台灣的當代作家。第二，和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同事創辦《中外文學》雜誌和比較文學博士班。第三，努力譯介西洋理論，例如《西洋文學批評史》、西洋文學批評術語叢書、莎士比亞通論等。張瑞芬的文章則對晚年顏元叔的「老輩風範和執拗脾氣」有著生動描繪。

2013年3月，《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15期刊出孫萬國文章〈追念「一個不平衡的人」——顏元叔〉，並附〈顏元叔書信三札〉，此篇紀念長文為理解顏元叔生平，尤其是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的背景材料，提供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描述。孫萬國是《中外文學》首任執行編輯，當年唐文標的文稿得以發表在《中外文學》上，皆假其手。至於孫萬國以筆名「趙知悌」，⁴所編輯出版的《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新北：遠景，1976.07），多年來也一直是理解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重要的參考材料。

同月，《中外文學》42卷1期刊出了「顏元叔先生紀念集」，這份在台灣著名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刊物（早期另曾登載文學創作與翻譯），正是顏元叔在1972年6月所創立。《中外文學》登載了顏元叔的前、後期學生宋美 與伍軒宏的回憶文字，以及呂正

惠的評論文章。宋美 對於顏元叔初任台灣大學外文系主任的記述（編選《大一英文讀本》），以及伍軒宏對於晚年顏元叔「棄聖絕學」（脫離學術框架，返歸作品）的評價，都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呂正惠的文章則著重在描述顏元叔最後二十年的心境轉移。對於呂正惠來說「文學評論家顏元叔始終不變的兩個原則是，文學要反應社會現實，而且，文學要有民族立場」。唯有如此，人們才可以理解顏元叔晚年為何能「變成一個超越黨派立場的民族主義者」。我個人同樣認為「民族主義」是理解「新批評之外」的顏元叔，一個特別重要的關鍵。而且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顏元叔在整個七〇年代所以對台灣現代文學批評產生如此廣泛影響的原因。因為七〇年代台灣社會思潮的主導性因素，正是昂揚激進的民族主義。

二、烽火女性

2013年度在台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題，是關於戰爭與女性書寫的論著。

8月，楊佳嫻的專著《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由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發行，這本專書是由作者在2010年所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而來。全書的主要工作是在勾勒1940年代上海的文學場域，並藉此描述女作家身處其間的位置。這個主題尤其深刻地表現在第三章第三節「烽火裡的閨秀：青年女作家與通俗刊物」，以及第四章「戰爭下的女性寫作」之中。楊佳嫻認為，相對來說，「戰爭記憶在男性文人筆下，永遠是和男性在亂世中的失落感、罪咎感相連，而蘇青、張愛玲的筆

4 本條材料最早由林瑞明老師告知筆者（約在2002年），孫萬國追念顏元叔的文章則公開表明這一點。

下，戰爭記憶卻是有喜有悲，有挫折有適應，民族國家話語的破裂帶來的痛苦，並非她們最關心的事情」。⁵

楊佳嫻在該書的緒論中表明，她是以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場域 (culture field) 論述，作為全篇論文思考的基礎。但其實，楊佳嫻真正的對話對象應該是 Michel Hockx，並且深受其論著 *Questions of Style* 之啟發。因此表現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懸崖上的花園》與其被視為「文學社會學」之類，倒不如說更接近於陳平原所開啟的「報刊研究」思路。更何況，Hockx 已經表明他對於文學的社會維度 (social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概念之形塑，主要來自於閱讀 Bourdieu，但是他對於早期民國文化的洞悉，卻來自於陳平原的教導。⁶ 整體而言，在理論維度的建構上，楊佳嫻並沒有超越 Hockx 所提出的「不完全他律」 (partly but not fully heteronomous) 的政治性維度，⁷ 而且事實上，她可能也「並不預備提出一種通用於所有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區與殖民地的場域論述」 (頁 59)。但與此相對的，楊佳嫻在「報刊研究」的方法上，卻展示了相當寬廣的視野，並且取得了相對豐厚的成果，尤其是在「戰爭下的女性寫作」，以及環繞在對張愛玲與路易士 (紀弦) 的研究上。而我個人認為這樣的研究方法與思路，確實值得繼續延續到對台灣殖民地時期，或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文學場域研究。

9月，崔末順的專著《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與吳佩珍的專著《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同時出版，而且他們也巧合地同樣論及戰爭下女性書寫的問題。崔末順的論著，主要是以「比較文學史的視角作為前提」，藉此「考察台灣和韓國的初期文學的進展樣貌」。⁸ 而在這樣的比較和參照下，崔末順歸結出了以「法西斯主義美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戰爭期的台灣文學與皇民化認同問題。崔末順認為「法西斯主義美學的出現，證明原本獨立於政治現實而存在的藝術，反而變成積極介入現實政治的事實。……政治與美學合作，成功地刺激了大眾的情緒和感性。日本帝國主義要求的國策內容及其審美化策略，就是要訴諸於殖民地台灣人民的情感，來推動大眾動員以維持戰爭。受到此審美化策略的影響，台灣文人和知識分子被壓倒在帝國主義論述下，失去了判斷能力，成為支持國策的勢力」 (頁 332)。

循著同樣的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崔末順在分析〈皇民化時期台灣與韓國的戰爭動員體制和女性論述〉時，最後認為：「女性對銑後夫人的認同，是經過排斥不屬於此形象的女性，並接受銑後夫人論述所傳播的特定自我認同而獲得。如此，排除和區分的策略，是戰時日本動員殖民地女性的主要運作機制。……也就是說，在皇民化過程中，形成主體的政治學，並不是只以民族和反民族的對立來達成，而是各按照階級、性別和身分地位，來接受特定內涵的國民認同才能

5 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8），頁360。

6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Boston: Brill, 2003), p.xi.

7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urrey, England: Curzon, 1999), p.12.

8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9），頁19。

達成。女性的認同也是如此，以透過排斥和銃後夫人對立的女性形象的方式，形成自我認同，成為皇國國民，並被動員以總力戰」（頁426-427）。我個人認為崔末順的研究成果，對於台灣文學史思考戰爭期的認同與皇民文學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值得繼續發展的視角。而這個視角可能也適用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50年代反共愛國文藝體制。

在關於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的研究中，吳佩珍的專著《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同樣讓人感覺印象深刻。「真杉靜枝成長於殖民地台灣，在日本文壇也以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知名，但時至今日，幾乎可說是被台日文壇以及研究者所遺忘」。⁹而吳佩珍的研究主要就在試圖喚回，這樣一個被人們長久遺忘的名字，因為「無論是文壇定位還是書寫主題，在日本文學史及台灣文學史都找不到真杉的容身之處」（頁11）。這是吳佩珍提出疑問的研究起點，雖然不是本書的研究重心，但這個發問確實值得人們繼續省思：那就是什麼樣的作品才能夠被編入（男性的）「文學史」之內？以及，像真杉靜枝這樣具有複雜身分的女作家（內地人但反覆書寫其殖民地經驗），究竟應該被放置於「台灣」或者「日本」文學史？

吳佩珍專著的主要研究成果，表現在其第二部分「台灣書寫的黃金期：『國策文學』的明與暗」，以及第三部分「帝國與帝國之間」，描述戰敗後真杉靜枝的「美國經驗」。對於前者，吳佩珍透過小說文本的細讀，認為「透過戰時在台日本女性形象的形塑，真杉雖描寫女性對於戰時下時局的積極

協力，卻也暗暗批評日本帝國對於殖民地台灣一直以來的漠視，而被壓抑的女性必須被迫肩負起因戰爭而缺席的男性角色責任」（頁105）。關於後者，吳佩珍則是透過真杉的「引揚者」書寫、雜誌編輯工作以及反映美國經驗的小說創作，描述「戰敗後日本帝國的崩落、日本人從帝國殖民者逆轉成為美國帝國的被殖民者的軌跡」（頁205）。我個人認為前一個研究視野，可以深化目前文學史敘事對於「皇民（化）文學」問題的認識；而後一個研究成果，則可以啟發（或者對照）近年來盛行的關於冷戰時期的文學／文化研究。

11月，吳佩珍還與陳芳明共同主編出版《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論文集。這本書的構成，最初是來自於政治大學台文所與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所共同舉辦的「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台灣皇民文學與朝鮮親日文學的對話（或比較）」學術研討會（2011年11月）。而在此論集中，台灣學者曾士榮與韓國學者金孝順，同樣處理了女性之戰爭經驗的問題。

曾士榮透過《阮木筆日記》（作於1942年），思考「處於殖民體制以及父權體制的雙重壓抑下的台灣女性，她們在戰爭期間的公共參與的空間與經驗如何？」¹⁰曾士榮最後認為，「阮木筆作為殖民地台灣女性菁英，在日本的二戰動員體制中的角色與處境具有多重的複雜性，此一複雜性不僅體現在『公經驗』與『私領域』之間較為較為細緻

9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9），頁207。

10 曾士榮，〈戰爭動員、日常生活與台灣女性：以《阮木筆日記》為中心〉，《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11），頁174。

差異的呈現樣態，也體現在所屬殖民地地位乃至國族認同上較為曖昧不清的差異性與趨向性之上」。此外，「阮木筆在戰爭動員體制下的角色並非全然如相關學者所論兼具『被動』與『邊緣』的雙重性格，她在婦女保甲團的公開演講行為兼有『被動』性格，以及履行自身職務與女性公共參與的主觀期待」（頁190）。這樣的說法和吳佩珍專著的論點，彼此是有相近之處，尤其是在「孤獨違和」的心態上。

韓國學者金孝順的文章，同樣是在考慮1940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動員政策，與殖民地女性知識分子的關係。並且深入追問在戰爭體制底下，「女性解放」這一機制如何發揮作用。金孝順最後認為「無論是抵抗還是協助，在女性作家的親日作品中可以了解到，是通過扼殺和鎮壓女性屬性的方式來抵抗或協助親日同化政策理論的」。但是，「在崔貞熙的親日作品中，女性屬性和戰爭意識型態結合的現象不是為了國家和社會，而是為了實現女性和人類的個人生活價值，這可以說是同其它親日作品不同的地方」。¹¹我個人認為金孝順的分析，更為有力地（而且細緻地）說明了女性在戰爭體制下的從屬性格之複雜狀態。因為「不能說女性作家的親日作品因為作家是女性，所以全都是關於追求女性屬性或追求女性解放的內容」。「即使是同樣的女性屬性，各個作家對其概念和女性解放的追求方法也有所差異」（頁336）。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視角，同時可以提供人們對決戰下男性作家的「從屬」狀態，進行更為細緻的區辨與考察。整

體而言，我認為考慮戰爭體制與女性書寫之關係的議題，是本年度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並且取得相對豐碩的成果。

三、虛實讀者

如果說，關於戰爭與女性的研究，主要仍是從作家「書寫」文本的角度出發，那麼與此相對的，考慮「讀者」與文本之關係的思索，是本年度台灣現代當文學研究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主題。

王惠珍論文〈帝國讀者對殖民地作家書寫的閱讀想像：以同人雜誌《文藝首都》為例〉，其主要的貢獻是在於採用「跨國」視角，對殖民地時期文學的傳播與發展，進行比較性的觀察。王惠珍是透過《文藝首都》的「文藝首都愛讀者」座談會、「各地讀者會」、「談話會」等欄位所呈現的記錄，將「當時代」（而且是越界的）的讀者因素考慮在內。這個視角在過去的殖民地文學研究中，應該是比較少見。王惠珍認為「欠缺殖民地經驗的同人讀者，對於殖民地作家的閱讀理解，……主要仍聚焦於殖民地作家的身分問題和文學技巧的問題，實難以理解作品背後隱匿著，知識分子被封建舊勢力與殖民地社會壓抑的抑鬱」。¹²而「殖民地的作家的作品的可讀性，往往聚焦於作品的題材內容，即是殖民地文學所提供的『異國想像』和奇風異俗」（頁26）。從這些現象看起來，帝國讀者與殖民地作家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鴻溝。而當時同屬於「日語帝國文化

11 金孝順，〈崔貞熙文學中表現的女性屬性和戰爭動員理論〉，《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頁337。

12 王惠珍，〈帝國讀者對殖民地作家書寫的閱讀想像：以同人雜誌《文藝首都》為例〉，《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頁28。

圈」中，台灣與韓國讀者之間彼此如何閱讀與想像對方，這個問題則仍然有待探索（頁28）。

在考慮「讀者」因素的相關研究中，我認為陳淑容和汪俊彥從報刊編輯與劇場管理的角度，所獲致的成果，同樣值得關注。陳淑容的文章〈爭取日文讀者大眾：黃得時及「新銳中篇創作集」〉，主要在探究黃得時如何藉由日文通俗小說，透過「日文學藝欄重組台灣文學場域，爭取讀者大眾」。¹³相對於「同盟通信社」的供稿，陳淑容認為，編輯黃得時和本島人作家群的「中篇小說」創作，是「由純文學走向通俗文學的嘗試」，是在尋求一個以「通俗文學」和「庶民大眾」為對象的讀者群。而「此一在地化的文藝生產姿態無疑是此特輯所以引人注目之處：作者與畫者共同構築的文字／圖像文本，經由日刊報紙的連載敘事，營造出雅俗共賞的想像空間，由此得以進入讀者的日常生活世界」（頁191）。因此「透過黃得時策劃的『新銳中篇創作集』成功爭取到日文讀者，也使得一個新形態的日文讀者大眾於焉誕生」（頁206）。我個人認為陳淑容的研究，是非常具有創新與洞見的成果。論者透過一個非常小的切口（新銳中篇創作集），卻清楚地說明了進入戰爭期之後，台灣文學發展在創作與閱讀上非常重要的變化與轉折。

如果陳淑容是透過報章編輯與小說作家的角度，為人們勾勒三十年代在報紙媒體場域中所「想像的」日文讀者，那麼汪俊彥的文章〈另一種群眾想像：現代性與殖民時期

的劇場〉，則是嘗試從戲劇的角度，為我們描述「另外一種」處於知識分子（現代化）對立面的「想像的」群眾，而且是使用並且接受本島語的群眾。汪俊彥認為：「文言不代表傳統，白話也不等同現代；事實上，是現代性的翻譯機制決定了什麼作為傳統、什麼又是現代。這種稱之為『聚眾』的另一種人民概念，提供了重新思考所謂戲曲觀眾、人民、公民、本島人、被殖民者等殖民同化時期之劇場與政治身分定義的機會」。¹⁴我個人認為在理論層次上，汪俊彥透過新式知識分子對劇場「群眾」的想像，從而揭示「現代性翻譯機制」的暴力邏輯，此一視角確實能夠豐富人們對於二十年代初期新舊文學論爭的認識，尤其是在揭示「新、舊」知識分子所共享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上。而這個的視角，其實也符合姚人多在2005年討論新舊文學論戰時，所曾經提出的思考，那就是：「也許我們該注意的不是新舊文學陣營那些『不同』的地方，我們應該在更深層的論述規則層次上來找尋這兩個陣營的相似處。有沒有可能在陳述（statement）的層次上，它們是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完全缺乏一致性，然而，在更深的形構層次上，卻有一個統一體（unity）與一致性，而且，正是這個一致性與統一體使得那些形形色色的陳述得以出現呢？」¹⁵姚人多的這個提問，對於汪俊彥來說，其答案應該就是「現代性翻譯機制」。

14 汪俊彥，〈另一種群眾想像：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台灣文學學報》22期（2013.06），頁144。

15 姚人多，〈文學的輪子是向前跑的：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中的非文學「化身」〉，《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03），頁126。

13 陳淑容，〈爭取日文讀者大眾：黃得時及「新銳中篇創作集」〉，《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7期（2013.10），頁188。

汪俊彥在理論層次上所展開的思考，確實可以深化目前文學史敘事的某些僵化段落（例如把新、舊文學簡單地對立起來），甚至為人們揭示某些被共同隱蔽的現代性暴力（例如對傳統戲曲及其群眾的否定）。但是汪俊彥在理論層次上所獲得的具有說服力的成果，在其論證材料的選擇上，卻仍有可以繼續思考的地方。例如，以張我軍為代表的「中國白話文」立場，是否能夠涵蓋二十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的「白話文」選擇，這一點恐怕仍然值得商榷的。尤其是把張我軍主張的「白話文」，拿來和「白話字與歌仔戲」所呈現出的劇場群眾的「語言」互相比較，這似乎就誤解了（至少是簡化了）當時所謂「白話文」的各種意涵，以及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新式知識分子對語言方案的繁複討論。尤其往後再經過台灣話文論爭與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如何詮釋主張「台灣話文派」的新式知識分子，和「白字戲與歌仔戲」群眾之間的關係，我個人認為這是值得繼續延伸的問題。

然而，如果人們願意在「日語帝國文化圈」的籠罩之下，進一步思考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語言的發展過程，尤其同時思考張我軍式的「中國白話文」是否（以及如何）在台灣的論述語境中成立，則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將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本專著是從《日本統治と殖民地漢文：台湾における漢文の境界と想像》（日本東京：三元社，2012.09）翻譯與擴寫（結論部分）而來。陳培豐是以「混成語」（creole）的概念，重新考慮台灣「殖民地漢文」的發展與意義。在此主導意識底下，作者認為：「檢證1920年代前後台灣媒

體的實際狀況與文體發展過程可知：發生於台灣的『中國白話文運動』，其實是一種類似在『殖民地漢文』的身體上套上『中國白話文』外衣的錯覺與想像，而這種錯覺與想像，其實是一種文體銘印（imprinting）現象的結果」（頁120）。¹⁶這樣的論點，確實為殖民地時期台灣的文學語言研究，帶來嶄新的視野與思考。而我個人認為陳培豐透過語言文體的研究，所得到了成果（尤其是在對「白話文」的想像上），應該可以和汪俊彥在理論層面上的探索，進行更好的對話與交流。

四、跨界比較

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是近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學界的重要發展主題之一。前述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等專著，以及《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論文集之出版，同樣都體現了近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取徑，在東亞（比較）文學領域中的擴展。在本年度的相關研究成果中，我認為韓國學者鄭炳浩的文章〈韓國《國文學史》記述中顯示的「親日文學（雙重語言文學）」的地位和變化〉，可以幫助人們對文學史書寫本身，尤其是文學史如何面對（以及書寫）殖民地時期的文學發展，進行深刻地反省。鄭炳浩首先將1945年以來各類《韓國文學史》，對於殖民地時期文學的記述（特別是用日文寫作的部分），做了一個簡明扼要的疏理。他認為，「韓國的國文學界自2000年以後，將1940年代的殖民地文

16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頁120。

學研究從『親日文學』研究轉向『雙重語言文學』研究，可以說這是把民族整體性作為重點的研究方向轉換成脫民族方向的一大過程。¹⁷我個人認為鄭炳浩的觀點，應該可以引導我們繼續思考，尤其是在關於「如何評價皇民文學」，以及「何謂台灣文學」這兩個長久以來爭議的問題點上。鄭炳浩最後提出應該「針對《東亞殖民地文學史》進行地區共同研究和記述」，亦即「跨國」地對殖民地時期的文學進行整體考察，而非僅限於以「一國文學」作為標準，或者僅在「補充本國主流文學中遺漏部分」（頁253）。我認為這個研究視野的擴展，確實值得台灣文學研究借鏡。但是建立「東亞殖民地文學史」的美學標準，恐怕仍舊會以日文為主導，而不大可能真正形成雙重（或多重）語言。至少在決戰下的台灣文學創作，以日文為主導的現象就非常顯著。

相對於前述的專著或論文集，主要著重在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東亞的文學與文化之比較研究。6月24日，成功大學人文社科中心、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在探討戰後以美國權力作為主導的文化冷戰，在台灣與香港兩地之發展。關於文化冷戰在亞洲的相關研究，前此可以貴志俊彥、土屋由香編輯的論文集《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作為代表。¹⁸

17 鄭炳浩，〈韓國《國文學史》記述中顯示的「親日文學（雙重語言文學）」的地位和變化〉，《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頁251。

18 土屋由香、貴志俊彥，〈文化冷戰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日本東京：國際書院，2009.02）。中文譯本：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著，李啟彰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06）。

在「媒介現代：冷戰中的台港文藝」研討會中，比較引人注意者，有香港學者樊善標的文章〈1940、50年之交《華僑日報》兩個「學生」園地的青年文藝培養〉，本文透過對陳君葆日記的分析，比較好地說明了香港左翼文宣的編輯主題與策略。與此相似的，香港中文大學張詠梅的文章〈溫和與激烈——試論《文匯報》副刊連載小說《港Q自傳》處理「反殖」與「反美」主題的策略〉，則是透過小說人物「港Q」的塑造，說明左翼報刊在處理「反殖」問題時比較隱晦，但在揭露「反美」主題時則就顯得直接而且激烈。這些從冷戰時期香港左翼報刊出發的視野，為台灣通行的「美援文化」研究，恰當地提供了一個「相反」的觀察角度，可以豐富人們對於「文化冷戰」的具體（矛盾）想像。

至於陳建忠的文章〈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則是透過吳魯芹作為個案研究，說明在「反共文學」與「自由主義」之外，以吳魯芹（男性）為代表的「閑適／幽默」散文美學，其「典律化」的過程其實與冷戰和戒嚴體制密切相關，而「吳魯芹散文之美學與思想，其實正是一時代人的美學與思想的集體投射，更是一時代人在流亡精神精神上的倒影」。而蔡明諺的文章〈製作豐年：美國在台灣農村的文化宣傳策略〉，則是透過國史館藏「農復會檔案」文件，說明了美國新聞處、經合會中國分署以及農復會，在1951年聯手製作農村定期刊物《豐年》的前後經過。人們通常認為在1946年10月25日之後，台灣的報章雜誌已經廢除日文版。但這樣的「常識」，卻並不完全符合當時台灣報

章雜誌的實際出版狀態。例如《豐年》從1951年7月創刊後，直到1956年底才真正全數廢除了日文的部分。更何況，《豐年》還同時刊載了台語話文、客家話語所創作的小說、歌謠、漫畫等。本文藉由農復會檔案，說明了《豐年》為何選擇這樣的語言媒介，以及如何能夠做出這樣的語言選擇（中日文合刊）。

從文化冷戰的架構下，「跨界」地考慮戰後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與樣貌，是近年來文學與文化研究正在擴展的方向之一。但與此相對的，另外一種理解「美援文化」與台灣現代文學之關係者，還有陳芳明的思考與論辯。9月，陳芳明出版專著《現代主義及其不滿》，而在論及〈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時，陳芳明說：「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絕對不能套用美援文化論的歷史解釋。畢竟現代主義運動的展開，是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滲入1950至60年代的台灣文壇。在美援文化還未臻於成熟境界之前，紀弦的『現代派』就已經在介紹法國的象徵主義。……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台灣現代主義的傳播並必然與『美帝國主義』緊密聯繫起來。朱西甯的現代主義，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歷史想像來推論，較為正確的說法是，朱西甯小說是以他獨創的實驗技巧，匯入了台灣現代主義的潮流之中」。¹⁹

陳芳明從個案觀察中，所推演出來的對於「美援文化」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關係的界定，應該值得繼續探索。在這本專著的序文中，陳芳明清楚地表明：「在2011年所完成的《台灣新文學史》，一言以蔽之，無

非是要為戰後現代主義運動進行辯護。」而現在集結出版的「這本文集，並非是對整個現代主義運動的全面評價，而是以抽樣的方式，來檢驗一個時代美學是如何形塑起來」（頁7）。從這個角度來說，《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可以被視為是《台灣新文學史》的延伸與補充。雖然這本專著所收錄的論文，在時間跨距上比較長（2003-2011），但整體上可以視為是陳芳明對於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個案研究成果。

在冷戰時期的相關文學／文化研究中，社會學者邱淑雯在9月所出版的專著《出外——台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提供了許多值得人們省思的現象與問題。邱淑雯在其田野調查工作中，重現了「1960至70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形象（第一章），並且藉由「南大東島島民與大林女工的雙向凝視」（第二章），以及對於諸如沖繩作家目取真俊的小說《魚群記》之分析，「主張以更多樣、變動、辯證的方式，處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宗主國與殖民地雙方的相互關係，架構出「『東方主義的再思考』此一視角」（頁111）。而我個人認為在超越「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對立結構，以及邱淑雯從實際田調中訪查得到的「女工觀點」（相較上層的知識分子觀點），確實值得未來在處理相關跨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時參酌。在大的冷戰時期文化交流框架底下，這群前往沖繩打工的台灣女性形象，似乎很少獲得知識分子關注。但是她們的離返經驗，無疑也是冷戰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邱淑雯的專著還討論了與女性與觀光事業相關的書寫議題。其中包括「過剩與闕如：千禧年後日本女遊書寫下的台灣意象」（第六

19 陳芳明，《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9），頁103-104。

章)、「過猶不及：千禧年後台灣女遊書寫下的日本意象」(第七章)以及「觀光業原住民女性的勞動身影：太魯閣族解說員對主客互動的詮釋」(第八章)。我認為這些「觀光社會學」的著作，同樣可以有助於在「旅遊文學」相關領域上的擴展。尤其是在如何「觀看他者」與「認識自我」這兩個互為表裡的書寫上。

五、彙編經典

2013年在台灣現代當文學研究發展上，同樣值得讓人關注的現象，是台灣文學研究資料的彙整出版，以及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成果發表。而這兩項工作，又以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所得最為豐碩。

12月12日，台文館舉行「台灣文學史長編」與「台灣古典作家精選集」新書發表會。其中「台灣古典作家精選集」共38冊，涵蓋從明鄭至戰後共44位作家，文類則包括詩、詞、文、賦及小說。「台灣文學史長編」共32冊，由36位學者合力完成，「該套專書以『原住民口傳文學』為首冊，『母語文學』為終卷，打破台灣文學研究以漢字為主軸的傳統」。²⁰

「台灣文學史長編」在出版後頗受關注，雖然其「專業／通俗」傾向的選擇，似乎也引來疑義。該套叢書出版後最為著名的書評，是黃錦樹所撰寫，批評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的文章。²¹但整體而言，「長編」

還是展現了中生代與年輕世代台灣文學研究者，集體撰寫台灣文學史的「可能」。在此之前，陳建忠等合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03），或者須文蔚主編《文學@台灣》（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9），同樣是在嘗試集體撰寫文學史的可能。而「長編」在文學史書寫上，至少是在撰稿者各自的「專業」領域上，確實是希望能夠達到或者呈現年輕世代研究者的現階段成果。

但另一方面，「長編」同時訴求能夠面對讀者大眾，並且期待能夠把專業的學術貢獻，轉換成為通俗易懂的表述，吸引普通讀者對於台灣文學的興趣和認同。從這個層面來說，「長編」的編輯理念更接近於「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山東：山東教育，1998）的文學史敘事方式。但「總系」是以某一關鍵的轉折年份，作為講故事的範疇，例如《1956：百花時代》、《1993：世紀末的喧嘩》等，這個體例應該還是受到黃仁宇的名著《萬曆十五年》之啟發。但是「長篇」選擇以「主題」作為區分，這就容易造成敘事時間長短不一，講述內容詳略紛雜的現象。再加上撰稿者的行文風格殊異，對於「專業／通俗」的取捨輕重有別，於是就比較難以符合編輯者最初的期待。但整體而言，「長編」的嘗試應該還是成功的，它至少為「台灣文學史書寫」留下了一個時代的印記和顯影，而且是「大合照」式的宏偉規制。

12月17日，「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舉行新書發表會，宣告完成50位台灣現當代作家的研究資料出版計畫。本套「彙編」的纂輯工作，是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

20 陳宛茜，〈台文館發表「台灣文學史長編」〉，《聯合報》，2013.12.13，A14版。

21 黃錦樹，〈這隻斑馬：評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灣文學館通訊》38期（2013.03），頁80-82。

辦，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承辦，而由《文訊》總編輯封德屏擔任總策劃。「彙編」最初緣起於「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編輯工作，該計畫從2004年4月起，由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負責執行，至2009年10月結束。共收錄310位現代當作家評論資料，總計86300筆。2010年11月，計畫成果集結成八大冊《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由台文館出版發行。²²在此基礎上，2011年4月8日，「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庫」（<http://cw.nmtl.gov.tw/>）正式公開上線，提供一般大眾在網路上檢索。這個資料庫的建置，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發展具有奠基的作用，而藉由網路平台的媒介，則可更多地促進本地研究者與國際學界的交流。

2011年4月，在線上資料庫發表同時，「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亦舉行了第一階段的新書發表會，公布15位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分別是：賴和、吳濁流、梁實秋、楊逵、楊熾昌、張文環、龍瑛宗、覃子豪、紀弦、呂赫若、鍾理和、琦君、林海音、鍾肇政和葉石濤。2012年3月31日，舉行第二階段發表會，收錄作家為：張我軍、潘人木、周夢蝶、柏楊、陳千武、姚一葦、林亨泰、聶華苓、朱西甯、楊喚、鄭清文、李喬共12位。2013年12月17日，舉行第三階段發表會，收錄作家有：姜貴、張秀亞、陳秀喜、艾雯、王鼎鈞、洛夫、余光中、羅門、商禽、痲弦、司馬中原、林文月、鄭愁予、陳冠學、黃春明、白先勇、白萩、陳若曦、郭松棻、七等生、王文興、王禎和、楊牧共

23位。以上合計50位重要台灣現當代作家，每冊內容包括照片、手稿、小傳、研究綜述、評論文章等，完整呈現歷年來台灣文學研究積累的豐厚成果。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從2011年3月出版以來，就獲得學界普遍地肯定。受此「彙編」的影響，近年亦有相似的研究資料叢書陸續出版。以本年度為例，5月，蕭蕭、白靈、羅文玲編纂《傳奇鄭愁予：鄭愁予詩學論集》由萬卷樓圖書公司發行。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錯誤的驚喜」、「無常的覺知」、「愁予的傳奇」與「衣鉢的傳遞」（最後一卷於同年12月印出）。收錄四十餘年間（1967-2013），鄭愁予相關研究論文七十餘篇。12月，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推出黃恕寧、康來新主編的「慢讀王文興」系列叢書。其中包括《嘲諷與逆變——「家變」專論》、《喧囂與憤怒——「背海的人」專論》、《無休止的戰爭——王文興作品綜論》（上、下）、《偶開天眼覷紅塵——王文興傳記訪談集》、《原來數學和詩歌一樣優美——王文興新世紀讀本》、《西北東南——王文興研究資料彙編》共7冊，書前皆附有編者導讀。本套叢書彙整了1960年以來，學界對王文興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各類評論，在總結與繼續開展王文興研究的道路上，實在具有轉折的典範性地位。

從「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庫」的設置（2011），到「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0冊完成出版（2013），人們似乎可以察覺到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正處在一個豐收但同時也是轉變的季節。十餘年前，我們在收集台灣文學相關材料時，只能曲身在

22 陳信元，〈建構台灣文學工具書的典範：評《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54期（2011.10），頁41-44。

圖書館的特藏室翻閱原件，蟄伏在老舊的機器前轉動微卷。或者兩手沾染塵垢，或者双眼佈滿血絲。但這些文獻材料「今朝都到眼前來」：人們只需要開啟電腦、移動浮標、點擊滑鼠，就可以在螢幕前直接翻閱、列印甚至下載。但是更為便利的資料庫（而且大多數是為了商業目的而建構），與龐大的、幾乎沒有盡頭的網路資訊，對於將來的文學研究，究竟是擴展？還是限制？我個人認為這是值得文學研究者省思的問題。在平板的時代，文學創作必須面對電子書的挑戰，而文學研究則應該思考資料庫帶給我們的便利和限制。我們已經更多地依賴網路伺服器的「搜尋結果」，而不是自己動手去翻閱、搜尋。由此，我們略去了許多與「關鍵字」沒有聯繫的版面和上下文，卻自以為是地以為掌握了更多的資訊。我們甚至常常忽略了，那些沒有「被建置」或者基於商業性（或政治性），被排除在「搜尋引擎」與資料庫之外的東西。

同樣處在豐收以及轉變的季節，「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既展現了秋高馬肥，兵強將盛的氣勢，但同時亦有秋收冬藏，迴還轉折之意喻。透過研究資料彙編，台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正在走向「經典化」，而這些研究「典範」的確立，既總結了前人的努力成果，但也同時為後人塑造了挑戰的高峰。下一個階段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如何面對這些典範，甚至超越這些高峰，將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繼續前進的主要課題。台灣文學系所近年來的發展，同樣嚴肅地遭遇了相似的問題。我們一方面感念於前人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墾耕耘，另一方面又對於繼志述事、克紹箕裘的未來道路感

覺猶疑。最近幾年，台灣的高等教育正面對著「國際化」，同時正準備著迎接「少子化」浪潮的衝擊。在這些外在的社會條件變動底下，台灣文學系所如何調整以及因應，文學研究如何繼續承擔及延續其社會責任與文化使命，這應該是下一個階段我們必須攜手面對的問題。

引用書目

-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Boston: Brill, 2003).
-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Surrey, England: Curzon, 1999).
- 土屋由香、貴志俊彥，《文化冷戰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日本東京都：國際書院，2009）。
- 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陳芳明，《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陳芳明、吳佩珍，《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
-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
- 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 汪俊彥，〈另一種群眾想像：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台灣文學學報》22期（2013）。
- 陳信元，〈建構台灣文學工具書的典範：評《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目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11.10）。
- 陳淑容，〈爭取日文讀者大眾：黃得時及「新銳中篇創作集」〉，《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7期（2013）。
- 黃錦樹，〈這隻斑馬：評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1963-2012）》〉，《台灣

文學館通訊》38期（2013.03）。

姚人多，〈文學的輪子是向前跑的：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中的非文學「化身」〉，《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余光中，〈顯極忽隱，令人惆悵〉，《聯合報》，2013.01.23。

陳宛茜，〈台文館發表「台灣文學史長編」〉，《聯合報》，2013.12.13。